

張志公

语言和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

论文选集



语文出版社

ZHANG ZHIGONG YUYAN HE YUWEN JIAOYU

张志公语言和语文教育

SIXIANG YANTAOHUI

思想研讨会

LUNWEN XUANJI

论文选集

本社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74 号

ZHANG ZHIGONG YUYAN HE YUWEN JIAOYU
张志公语言和语文教育
SIXIANG YANTAOHUI
思想研讨会
LUNWEN XUANJI
论文选集
本社编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2.125 印张 300 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8.50 元
ISBN 7-80005-710-6/H·154

勤于探索

勇于改革

祝賀志公同志

在語言和語文教育的貢獻

雷洁琼



一九九二年十月



研讨会会场。



研讨会前夕张先生拜访冰心老人。



雷洁琼同志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贺词。



人教社总编辑吴履平同志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贺词。



张先生在研讨会开幕式后与领导人和部分代表合影。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教师代表向张先生献花。

前　　言

李行健

张志公先生是我国蜚声中外的著名语言学家。他从事语言研究和语文教育工作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默默地工作，为语言研究和语文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赢得了国家和人民的赞许。为了总结志公先生的科研成果，学习他的治学育人的经验，表彰他无私的奉献精神，20多个学术团体和文化教育单位发起，于去年10月在志公先生的故乡河北省石家庄举行了“张志公语言和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参加会议人数之多而踊跃，论文数量之大而质量高，会议之隆重和热烈，实为近年来学术讨论会所少见。冰心老人专门为大会题了辞。不少外国学者也闻讯赶来参加会议。我想，这一切正是大家对志公先生50多年来的学术历程和成就的肯定和赞颂。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次活动将有助于语言学的研究、语文教育改革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开展。所以，在这次研讨会筹备时，我们就当仁不让地希望出版研讨会的论文集。

(一)

志公先生在语言学和语文教育工作中的突出贡献，一方面表现在不少学科领域中的独创性的成果，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整个学术活动探索的广阔。后一方面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比如志公先生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才，不论是在语法、词汇、文字、修辞、语文教育现代化和传统语文教育经验的研究探索，还是在汉

语教育和外语教育、汉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等等领域内，都有志公先生的足迹和引人注目的成果。人的一生本来精力有限，但志公先生在繁忙的本职工作的同时，在身兼许多社会工作的环境中，竟然在这么多的学科内辛勤耕耘，普遍结出了色彩各异的硕果，这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吗？这正是志公先生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忘我精神的体现。这也正是志公先生在学术界、教育界，在国内外都有广泛影响的一个原因。

志公先生独创的成果很多，讨论起来可能见仁见智。但我认为当以创建现代化的辞章学、全面研究总结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教训，积极倡导并推广小学语文教育“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三项为最突出。这些带有开创性的工作，既开拓了语言学和语文教育工作的新天地，又把语言学的成果向实际运用方面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志公先生在上述两方面的贡献，这本论文集中都有专文论述，读者可以自己分析论断，不用我赘述。

(二)

志公先生在为文处世上，能获得那么多的成就和荣誉，我认为在于他有一个特大的优点，那就是他一貫实事求是，没有门户之见，善于取长补短。从学术上看，我们可以志公先生两次主持制定中学语法教学体系为例。众所周知，我国现代的语法研究，从《马氏文通》以来，出现许多流派和大家，他们对汉语语法的许多基本事实的看法和分析因人而异，甚至矛盾对立。学习语法的人，往往感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致产生畏难和学了无用的情绪。解放后，要新编语文教材，要制定中学语法教学大纲，就需要将黎锦熙、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各大家不同的语法体系吸收综合，搞出一个新的体系来。这个体系要为大家接受，能真正用于教学，必须博采众长，综合折中。但这谈何容易！要取长，

就要眼光敏锐，看到看准人家的“长”。要把“众长”综合熔铸成一个新的系统，那就非有高超的手法，非凡的能力不可。为了综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有时还不得不“在互相矛盾，互不相下的几种说法之外寻求一种言之成理、能为诸家所接受的新的说法”（《张志公文集》第一卷 471 页）。此中的甘苦，局外人是很难想象的。志公先生在《汉语语法体系分歧问题》一文（《张志公文集》第一卷 466 页）中有所披露。事实证明，志公先生是完全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高手。在他主持下，50年代制定的《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和80年代修订的《中学教学语法提要》，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经受了教学实践的检验。

从志公先生组织领导学术活动看，正因为他具有求同存异，综合折中的特长和气质，所以也往往使许多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1991年夏天，海峡两岸计划共同召开一次汉字学术讨论会。大陆方面由两个学术团体作主办单位，而这两个团体在许多方面意见很不相同，台湾学者方面的意见同大陆也不一样。形成两方三派意见。志公先生作为会议的主要组织领导者，如何团结好不同意见的学者，开好这次学术讨论会就至关重要，也正是由于志公先生发挥了他以诚待人，实事求是，调合折中的领导艺术才能，终于使会议顺利召开并圆满结束。正是由于志公先生这方面的气质和度量，才使得他晚年逐渐成为一位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党和人民委以重任，使之走进另一个新天地。志公先生也乐于为国家的繁荣和兴旺而不辞辛劳地活动在政治舞台上。

志公先生在总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有一个很突出的指导思想，就是为实用而学术，绝不搞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架式。他最有独创性的三个方面成果，也正是学术为实用、为解决语言文字应用的问题而开展的工作。这也正是他能取得超越前人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志公先生在语法研究方面的“精要、好懂、管用”“六字箴言”，正是他这种光辉思想的结晶。这六个字得来不易，是志公

先生在语法研究中，有针对性地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语法不“精要”，容易流于烦琐，也就很难达到“好懂”的要求，更谈不上“管用”了。所以要“管用”就必须“精要”，只有“精要”才能好懂。因此，可以说“精要、好懂”都是手段，“管用”才是目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才能把复杂的语言学的原理、规律说得那么清楚、明白，他才能把修辞学的研究从烦琐的“辞格”中解放出来，他才能把语法的字词句研究和修辞表达的研究等综合扩展为新的辞章学，也只有这样他才能主持制定出两个为专家接受，受读者欢迎的教学语法体系。去年4月，在纪念《中国语文》出版40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志公先生又发人所未发的高论。他认为语言学本来是最能为实际应用服务的学问，可现在许多研究的人和学习的人感到语言学不好为实际应用。志公先生认为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反映出语言学如何为实际服务，还未找到一种有效的机制。因而，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中介性的机制，它可以把语言学向实际的应用转化，把实际应用和语言学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这些设想，无疑有振奋发聩的作用，这也是志公先生寻求语言学“管用”的积极探索。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为现实服务的学风，正是我国几千年来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志公先生贡献给学术界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我敢于发表上面这些无知妄说，有一个自我宽慰的原因。那就是我把志公先生一直尊为我的老师，而志公先生不弃，也把我视为他的弟子。学生说错了话，先生是不会过多责怪的。我说这些，绝不是没有具体内容的客气话。

1952年，我在重庆大学（一所工科重点大学）预备班读书。当时，升入大学本科的专业是机械制造。由于受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语法修辞讲话》的影响，也对语言知识的学习有了一

点业余的兴趣。在学习的过程中，当时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给志公先生主编的《语文学习》写去一篇《谈“着”和“了”用法》的文章。久未得回信，我认为大约不值得编辑先生一顾，所以也就淡忘了这件事。殊不知有一天，突然收到《语文学习》社来的一封退稿信。信中充满热情关怀、真诚鼓励的话语，使我感动不已，乃至经过几十年的折腾、搬迁，这封信仍完好地保存在我的书厨里。因为我认为那是一封有一些纪念意义的信。信的开头说，没有尽快回信“非常抱歉”。他们对文章研究过多次，打算让我修改后发表。我真有点儿受宠若惊了！由于当时正准备北上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所以也未能应命修改那篇真正的“处女作”。往事重提，是要说明志公先生主编的《语文学习》在我这个当时学工科的青年中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我这个未入语言学门的青年的关心和扶持。这是我同志公先生最早的一次往来。因为那封40年前的信，经志公先生辨认，确系出自他的手笔，虽然当时我不认识他，他更不可能知道我这个后来真正“皈依”了语言学的学生。后来由于我在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学习，常读志公先生的书，看他写的文章。但我也只能算他的私淑弟子。后来我在天津一所大学工作，并且做天津市语文学会的日常工作，请过志公先生去做学术报告，才算有了直接的交往，直接聆听他的教诲。1983年我调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语用所工作，不久又调语文出版社协助社长吕叔湘老师工作。由于同在一个城市，又有业务上的关系，才经常有机会去找志公先生请教。他当时是语委（文改会改建后叫语委）委员、职称评审委员等。有时开会就能见到他。凡是语文出版社有劳志公先生的事，他都有求必应。这除了他同吕叔湘先生和语委多位领导人的深厚友谊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那就是语文出版社的组建，志公先生是亲与其事的最积极的学者之一。由于叶圣老、叔湘师和志公先生等倡议，文改会有关领导的支持，语言学界唯一的专业出版机构语文出版社才得以于1980

年正式成立。而成立之初，即拟定由吕叔湘先生任社长，志公先生任总编辑。但由于阴差阳错，叔湘先生以近80岁的高龄，担任了社长，而志公先生却始终没有到任。这才有了我承乏去协助叔湘师主持出版社工作的由头。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的原因，志公先生始终把自己视为语委的工作人员，视为语文出版社的编外成员，也才使得我们敢于常劳他大驾，请他开会，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使我们受益不浅。

(四)

有了这些难忘的平凡往事，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出版好这本论文集。志公先生原订论文集只“精选”20万字左右的文章，他怕出版社亏损太多。后因质量好的文章不少，我们又修改计划，增加到现在这样全书30万字。即使这样，也有不少好文章未能入选。因为篇幅所限，同这次研讨会关系不大，主要阐述自己某一专题研究的论文，内容重复或差不多的论文，都只好忍痛割爱了！我们只好向未入选的论文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在编选过程中，志公先生多次提出：“入选的文章要实事求是，不要‘吹喇叭’。”在他的建议下，我们把一些文章的标题或个别提法做了文字的修改或加工。事先来不及征求作者同意，也请各位谅解。

入选的48篇论文，涉及到志公先生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各个方面。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按照论文的内容作了以下分类：

- (1) 总论张志公先生的学术活动和成就；
- (2) 张志公先生与汉语语言学；
- (3) 张志公先生与汉语辞章学；
- (4) 张志公先生与语文教学；
- (5) 张志公先生与传统语文教育；
- (6) 张志公先生利用汉语拼音，改革小学语文教学及其“双

文”论；

(7) 张志公先生与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

(8) 张志公先生与编辑学；

(9) 张志公先生的治学、为人风范。

以上分类，在目录中用空行的办法加以显示。

编选完论文集的时候，志公先生命我写一个前言。我遵命拉拉杂杂地写了自己对论文集的感受和从志公先生处受到的教育，以及论文集编选的一些情况。不妥之处可能不少，请大家指正。

在论文集编选中，隆林同志出力最多，同时也得到《河北师院学报》编辑部、《语文周报》社同志的大力支持，对此深表谢忱。

1993.6.15

序 一*

吕叔湘

去年(1991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张志公文集》。第一卷是《汉语语法》，一开头就收进了志公同志最早那本语法著作《汉语语法常识》。他自己在这本书的末尾新写了一篇《跋》。跋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常识》产生的前前后后，少不了说些谦虚的话。最后，他跳出《常识》，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从写作动机和写作态度方面作了一个概括。他概括出了两点。一点是，几十年来，无论写了些什么，写了多少，写到什么水平，无一不是为了适应工作需要而写的。再一点是，不论写的东西有多少分量，写的时候心情是诚恳的，说的是自己的话。没有写过自己不明白而随声附和的东西，没有写过违心凑热闹，赶浪头的东西。

就我跟志公多年交往中的了解，他自己概括的两点是事实。从50年代起，他工作单位没多少变化，担任工作的样数可不少。他总是服从需要，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就钻什么，研究什么，写什么。他编过语文刊物，一连9年，出了108期；他编过汉语教材，英语教材，俄语教材；他经常在一些学校和学习班上讲课，经常应邀给一些报刊写稿，经常被一些作者要求给他们的著作写序，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学术会议，要提交论文，准备

* 编者按：这是吕叔湘先生为研讨会写的书面发言，应张志公先生的建议，用为本书序。

讲稿或提纲。如此等等。他做这些事都是认认真真的，绝少是马虎应付的。他的许多文章就是这样为了岗位工作的需要或者外加的差使而写的。他自己也感到头绪太多，有些吃不消，可是只要找上他，他总不好意思拒绝，用北京话说就是“磨不开”。他自己说：这样，时间精力太分散，不容易集中专一而流于杂。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对某些问题进行相当深入的研究，提出对人有所启发的见解，这是很难得的。

志公自己概括的第二点，似乎是有所为而发，不过话说得含蓄，细心的读者是不难领会的。

以上说的这两点，看上去好像不是学术问题，然而搞学术工作就免不了要遇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处理好，所谓学术研究很可能变成孤芳自赏或者随风转舵。志公处理得相当成功，这中间是颇有些甘苦的。

研讨会主持者知道我和志公的关系，要我谈点意见。我觉得不应该推辞，就从他自己概括的两点谈了如上一些感想，供大家参考。至于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观点问题，就请大家来共同研讨吧。

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序二*

柳斌 刘缙

志公先生是我国语文界的前辈，他精通汉语、英语、普通俄语等多种语言，是我国著名的语法学家，语文教育学家，修辞学家。他的著述不仅蜚声国内外，而且将对我国的语言研究和语文教学工作产生广泛而长远的影响。

志公先生不赞成把语文课教成纯粹的知识课，而强调语文课要在简明、科学的语文知识指导下以听说读写融会在一起的语文实践为主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依归。志公先生的这一主张发扬了传统语文教学的积极因素，摆脱了其消极影响，从而引导语文教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此外，志公先生对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也非常关心，提出了不少指导性的意见。

志公先生不仅为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建设辛勤耕耘了50年，而且积极参与制订并始终维护我国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为简化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因事不能到会，特致函祝大会圆满成功，并祝志公先生健康长寿。

1992年10月22日

* 编者按：这篇是致研讨会的贺信，应张志公先生的建议，也作本书序。